

陈君静 / 著

大洋彼岸的回声

美国中国史研究
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K207
C472

陈君静 / 著

大洋彼岸的回声

美国中国史研究
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洋彼岸的呼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 / 陈君静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ISBN 7-5004-3893-1

I. 大… II. 陈… III. 中国-历史-研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8982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晓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宜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海东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意图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陈述、分析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演变。为什么不冠之为“汉学史”或“中国学史”？这还得从“汉学”和“中国学”的概念说起。

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Sinology”这一译名，以及“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种看法：一是将“汉学”等同于“中国学”；二是认为“汉学”与“中国学”虽都指海外的中国研究，但所指的时期和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三是反对译成“汉学”，一律改称“中国学”。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习惯于把海外对中国的研究称为“汉学”，并将“汉学”与“中国学”等同起来。王景伦在《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中就如说是说：“汉学（Sinology）亦称中国学（China Study），作为外国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最初是在英国发展兴起的，二战后，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国遂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中心。”^①显然，王景伦所称的国外汉学研究最初兴起于英国的判断是一种误读，它至少忽视了传教时期意葡法籍传教士对海外中国研究所做的贡献，但他所提出的“汉学即中国学”的主张，却是许多学者所认同的。在他们看来，汉学作为国外系统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诸方面”的学问，作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称

^① 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之为“中国学”(the Chinese Studies)^①。

应强调的是,在主张“汉学即中国学”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海外中国研究内容的历史演变。他们在肯定“汉学”与“中国学”两概念同一性的前提下,对两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适用性,作了区分。

他们一般把二战前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汉学”,认为那时汉学家们的研究是以古典时代的内容为主要对象,探讨的范围集中于语言、历史、文化等人文学科,其研究具有描述性、资料性、工具性。二战爆发后,由于中国成为主要战场,古典内容的研究变得很不适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的需要,由此对现实中国的研究成为关注的重点,域外“汉学”研究也因此演变为“中国学”研究。

就美国的中国研究来说,他们虽然认为“‘汉学’应该是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但却主张把二战后美国的汉学研究称之为“中国学”。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的汉学研究已逐渐向以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为特征的中国研究转变,其标志是“注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相互关系,而对中国古代文明只做背景的介绍”^②。为了进一步区别两个不同时期中国研究的特点,有些学者便将二战前的中国研究称之为“传统汉学”,战后的中国研究则名之为“现代中国学”(the Contemporary Studies)。这一观点,与日本学者福井文雅基本一致。福井文雅在《欧美的道教研究》中指出:“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 Sinology 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 Chinese Studies (中国研究)。”^③

①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如卢敦基称:“汉学,国外又称中国学”(《翘首以待“汉学史”》,载《中国出版》1991年第3期)。

② 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③ [日]福井文雅:《欧美的道教研究》,见[日]福井康顺:《道教》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一些学者还就将海外的中国研究概称为“汉学”的观点提出了异疑。他们认为，简单地把“Sinology”翻译为“汉学”是片面的。因为：（一）“汉学”本来指汉代的训诂之学，又称“朴学”，用它来指代中国研究，易生混淆；（二）中国研究的对象现扩展到中国的各个方面，远非“汉族的”一词可涵盖，“有许多问题根本与‘汉或非汉’的问题无关”；（三）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把对中国研究的中国学说成是“汉学”，显然不妥；（四）“汉学”这一名称时代感不足，不能把当今世界对现代中国研究这一主题包括进去。总之，学术界必须“把Sinology的中译名订正为‘中国学’”^①。

由上可见，学术界在“汉学”、“中国学”与国外中国研究关系问题上存在着颇多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还会继续下去。但是，这些分歧只是概念定义上的差异，作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仍照样发展下去。

事实上，国外“汉学”抑或“中国学”本身并无后来学术界所认定的藩篱。因为任何概念的抽象都后于事实，只能概括现象的主要和基本特征，不可能涵盖一切方面，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以抽象的语义学层面讨论其内涵外延虽有助于理解其实际涵义，但还不如由发生过程的复杂事实来综合认识模糊概念所包括的具体内容。这就是说，在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前，将“汉学”、“中国学”，或以前后两个阶段来表述国外中国问题研究，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里，有必要阐述一下著者对此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从严格意义上讲，“汉学”只把中国研究的范围限制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它不能包括中国其他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如蒙古学、藏学、满学等）；而学界所称的“中国学”虽侧

^① 孙越生、李明德主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重于当代和现实问题，但却能将中国各省、各地区、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都纳入进去。更为重要的是，二战后国外的中国研究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与原有的汉学传统有着重大的差异。不仅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以往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且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情况，都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再将这种研究视为旧有汉学的扩大与延续，似乎缺乏学理上的根据。鉴于此，著者认为，作为一种学术的历史现象将古典形态的中国研究（限于对汉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称之为“传统汉学”未尝不可（本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汉学”这一概念的），但将所有的中国研究名之为“汉学”似为不当，因为汉学研究仅仅是所有中国研究的一部分。那么，本著为什么不冠之以“美国中国学史”？

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学”的概念太大，而且也不能准确地表述本著所要论述的内容。“汉学”也好，“中国学”也好，指的都是中国研究。但这并非是一门由单一学科领域构成的学问，而是由许多不同专业领域组成的多门学问的大拼盘，它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是研究的对象与中国有关。因此，“中国学”与“东方学”、“印度学”、“埃及学”一样，它的特殊性不是体现在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而国外的中国研究，虽然有跨学科的性质，但绝大多数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专业领域。这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能把国外中国研究中的某一学科（如历史学）的研究泛称为“汉学”或“中国学”，而且还必须首先做到对这些成果的分学科研究。在这方面，考察他们对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是一个有文字历史的国家，而传统的中国研究大多是以“文字文化”或“精英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正是这种从“文字文化”所得出的结论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促进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推动着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从美国中国研究的形

成、发展史来看，无论是传教士、商人、外交家，还是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历史的体识构成了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著致力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考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起步于鸦片战争后，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欧洲，但自二次大战后，逐渐取代日本和欧洲，成为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重镇。自那时起，美国出现了一大批引领时潮的学术人物，推出了一本又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明清以来历史的研究，在海外中国史学界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对这些成果的回顾、梳理及其评介，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就美国中国史学界而言，柯文（Paul A. Cohen）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便是对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此外，黄宗智、刘广京等学者也分别撰文对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现状作了简要的评述。^①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20世纪80年代前研究情况的初步爬梳和整理。而且，柯文本人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想借此书来阐述当时风行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中国中心观”。此著反映的是一个美国学者的观点。

国内最早介绍国外中国研究的著作是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该著共7章计169页，1949年1月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出版。在篇幅占全书近一半的第7章中，莫东寅对鸦片战争后各国汉学研究情况分国别作了论述，其中有对美国汉学研究的介绍。该书虽然有许多内容直接借用了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所著的《欧美对中国的研究》（日文，1942年创元社刊行），但它

^① 如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刘广京：《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阿里夫·德里克：《评美国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载《国外近代史研究》第10辑）等。

在介绍和宣传海外中国研究方面所起到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抹杀。

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关这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较为沉寂。即使有少量的介绍（如翻译出版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主要也是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反面教材供批判使用。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国内史学界日益重视海外尤其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许多学术杂志腾出一定篇幅介绍美国同行的研究动态，几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著述，从而使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得以较为广泛地进入了中国史家的视野。海外学者有关各种研究模式的争论也成为部分学者的讨论话题。尤其是译丛的出版对于促进我国读者对西方中国研究的了解，加强中外学术互补，繁荣学术，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①

然而，国内对美国中国史研究学术思想的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介绍性的内容多，系统性的研究少。而且，许多研究更多地从“汉学”和“中国学”的层面进行探讨，缺乏从史学的角度来探究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走向、特点及其影响。如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美国观》主要考察的是当代美国学者有关中国现实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诸多领域的一些看法，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史研究。侯且岸的《当代美国的“显学”》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地研究美国中国学的一部著作。该著虽强调了历史学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主体，但由于侧重点仍放在对“以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为特征的中国研究”

^① 这些译丛主要有：王庆成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东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08—1995年，27辑）；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在推出的译著中，大部分著作出自美国学人之手。

上，其研究仍缺乏对史学的关照。^①

本著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上述研究的不足，从史学的角度，对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并试图通过这种较为深入的研究，就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特点、理论模式、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做出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评估。为此，本著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力求有所突破。

首先，理清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线索。作为中国人看外国的中国史研究，不仅要知其具体研究成果，还应当研究这种学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脱胎于新教传教士和外交家时期的中国研究，在许多方面深受欧洲传统汉学的影响；二战前后随着“地区研究”的逐渐建立，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史研究；战后由于受“冷战”影响受到短暂的挫折，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重新兴盛起来；60年代末到70年代，新一代学者通过对以往学术的批判性重估，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阶段；80年代后期由于受新文化史（或新社会史）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史学历程大致经历了由“官方史学”到“民间史学”的演进过程；研究的侧重点则从政治史、思想史扩展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个领域；中国史观也由“西方中心观”演变为“中国中心观”，并进而发展为“多中心”或“无中心”史观。

其次，对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各种思潮、流派及其观点做出评

^①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第197页。其实，国外的中国研究虽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西方学术界，距离主流学术仍很远。各大学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和系，人数也不多。据黄宗智介绍20世纪80年代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很可能会失业，这说明“美国的近现代史研究极盛时期已经过去”[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概况》]。因此，以历史研究为主体的美国现代中国学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显学”。

估。^① 本著将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各个学术发展时期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及其成果的探讨，把握不同学术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学术理念、学术著作、学术思想、学术团体的演变，并揭示各个阶段的学术特点。当然，作为对美国中国史研究学术史的评析，除了对其史学成果进行分析评估外，还应对渗透于各种史学成果之中的理论基础（主要指：中国史观、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价。为了能够更加准确、深刻地评价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成就，本著还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演变放在其国际国内的社会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既受到了美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冲击，也深受国际学术思潮的影响。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史研究的“沉默”与麦卡锡主义的猖獗直接相关；而它追求打破传统史学“单科独进”的研究方式，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行多学科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学术趋向，就是整个西方史学（特别是年鉴学派）发展趋势的一种反映。

第三，将考察的重点放在对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上。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在其形成之初就十分注重对现实的关照，这就使得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明清以来的历史，从而使明清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主要热点。同时，由于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与近现代中国在历史连续性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亲密关系，许多美国学者往往把这一时期视为中国的“现代早期”，或为中国近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系统地考察美国学者对明清以来中国史研究学术成就比较符合这一学术领域的客观实际。

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译介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以及对他们学术思想的再研究，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而且还

① 本著所讨论的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包括美籍华人。

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尽管他们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内在的局限性，但是，及时地介绍他们的研究动态，系统地总结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准，加强中外学术交流，无疑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学术积累工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端	(1)
第一节 16—18 世纪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初创	(1)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东来及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 评介	(16)
第三节 美国传教士中国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29)
第二章 专业化中国史研究的逐步形成	(43)
第一节 外交史学的兴起	(43)
第二节 从太平洋关系学会到远东协会的建立	(55)
第三节 费正清与美国中国史研究新局面的开创	(68)
第四节 拉铁摩尔的中国史研究	(82)
第三章 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曲折发展	(97)
第一节 麦卡锡主义及其影响	(97)
第二节 费正清与哈佛学派的崛起	(107)
第三节 两极理论下的美国中国史研究	(122)
第四章 关于“毛主义”的争论	(148)
第一节 美国记者与红色中国的报道	(148)
第二节 关于“毛主义”的争论	(163)
第三节 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思考	(179)
第五章 超越传统与现代性	(192)
第一节 “中国中心观”兴起的历史背景	(193)

第二节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结合	(205)
第三节	地方史研究浪潮	(224)
第四节	超越传统与现代性	(238)
第六章	中国史研究在几个重要领域的新进展	(257)
第一节	在国家与地方之间——“地方精英”研究	(257)
第二节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关于“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	(274)
第三节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 论	(292)
第四节	新文化史研究与后现代取向	(308)
代结语	关于“中心史观”的再思考	(327)
主要参考文献		(332)
后 记		(345)

第一章

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端

第一节 16—18世纪耶稣会士与 西方汉学初创

美国中国史研究在西方国家中起步较晚，始于19世纪30、40年代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而且在它的形成时期又深受源于耶稣会士开创的欧洲传统“汉学”（Sinology）的影响。因此，要了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缘起，就必须从16—18世纪耶稣会士东来与西方汉学的初创说起。

一、葡萄牙、意大利籍耶稣会士与他们的中国研究

15世纪末是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非洲好望角绕航成功，美洲的发现和欧亚航线的开通，使中西交通愈加便利，直接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xco da Game）率领船队绕过好望角，于1498年抵达印度卡利库达，成为第一个经由海路到达印度的欧洲人。接着，葡军在击溃土耳其、阿拉伯和印度联合部队后，葡萄牙人于1510年占领印度果阿，把它变成了东方殖民地首府。翌年又攻占了马六甲，并在1557年正式占据澳门。与此同时，西班牙沿着哥伦布西航的方向，相继征服了墨西哥、中南美洲，并由麦哲伦率船队穿过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横跨太平洋，于1519年抵达菲律宾，开辟了一条由西向东到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航线。

新航路的开始，不但为殖民国家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也刺

激了天主教东来的热情。16 世纪上半叶，欧洲的宗教改革使天主教失去了不少地盘。为了重振过去势力，天主教在欧洲掀起了所谓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并企图通过扩大海外新教区来加强自身的力量。1534 年，西班牙人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在巴黎创立了耶稣会，六年后该组织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成为天主教向海外拓展传教区的重要组织。

1552 年 10 月耶稣会主脑之一沙勿略（Saint François-Xavier）搭乘葡萄牙商船来到中国珠江口外的上川岛。沙勿略在上川岛，刚好碰上明朝海禁最严厉的时期，因此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同年 12 月就病逝在该岛。虽然沙勿略没有达到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布道的目的，但他的到来标志着新航路开辟后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的开始。

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耶稣会士是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79 年，他受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的指派到达澳门。罗明坚在澳门悉心学习汉语，为进入中国内地做准备，期间曾三次前往广州，要求居住内地，未获当局批准。1583 年，他终于在向广东地方当局表示愿意成为中国皇帝的子民后才获准进入广东肇庆落脚。紧随罗明坚而来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hew）。利玛窦与罗明坚在肇庆住了一段时间后，于 1589 年移居韶州，并逐渐深入南昌、南京、北京传教。自此以后，耶稣会士在利玛窦和罗明坚的带领下，开始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为了便于传教，耶稣会士往往苦习汉语，大多能读懂中文典籍，甚至用中文写作。1584 年 10 月 21 日，罗明坚在一封信中说：“今年有 10 部关于这个伟大王国的历史书籍从皇城北京运来”，“我们俩人（指与利玛窦）不但已经能阅读和理解这些著作，而且也可以和一般中国人谈论书中的内容”^①。

① 万明：《从八封信简看耶稣会士入华的最初历程》，载《文献》1993 年第 3 期。

这次传教与唐时景教、元代罗马教的传播有所不同，它不仅促进了西学传入中国，而且还推动了欧洲中国问题的研究。他们在致力于传教的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了第二种身份——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研究者。

由于葡西两国在地理大发现后掌握了海上贸易的霸权，而葡萄牙在东方的势力又最大，罗马教廷便把东方布道事业的统治权交归葡萄牙，在澳门设立主教，统辖中国的宣教事业。因此，在传教阶段的最初 100 年里，葡籍和与葡萄牙有联系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在数量上占据优势。这批早期耶稣会士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研究语言，编纂经典，向西方介绍中国。欧洲人大规模翻译中国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还是在耶稣会士来华之后。为了达到“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的目的，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把翻译中国经典作为其在东方古国传教布道的一种手段。为了便利传教，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在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在华传教生涯中，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语言，钻研中国传统文化，翻译儒家经典。他与另一传教士罗明坚合编了一本《中文字典》，自己又翻译出版了《四书译本》。尽管利玛窦的《四书译本》只是一些片断而非全文，但却为后来的传教士树立了榜样。他们纷纷效法利玛窦，把最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儒家经典的翻译上。到17世纪70年代，四书已相继译成并在欧洲刊出。其中最有贡献的是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他于1662年与另一耶稣会士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一起译出了拉丁文本《大学》，取名《中国人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他还在1667—1669年刊出了《中庸》译本，名曰《中国人的政治道德学说》(Sinarum Sientia Politico-moralis)。此外，早期耶稣会士还把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通过书信、札记介绍给欧洲。利玛窦的札记经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整理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为书名于1615年出版，中文译名又叫《利玛窦中国札记》。该著专门有一章介绍“中国人在文学和科学及